

毛泽东怎样开展调查研究

□ 苏亮

毛泽东多次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的途径，并身体力行地在各个时期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调查具有躬身入局和尊人民为师的显著特征，且对调查的结果研究，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三者统一体现于调查研究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躬身入局：“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

毛泽东认为“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并“躬身入局”，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向人民学习，拜群众为师。

调研前充分做准备。毛泽东一生开展的多次调研活动，在调研前都一般会做准备，经过“打腹稿”，事先思考调研方案，有些调研他还拟定调查提纲，列出大纲和细目，做足各项准备。例如在韶山银田寺座谈中，他提出的调研问题就有：区乡农会的组织发展如何？农会干部的成分怎样？办审公道不公道？农会办了些什么好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最终取得了丰硕的调研成果。

高质量召开座谈会。毛泽东非常重视通过大范围地开高质量的座谈会以听到真话。他每次召开调查会，规模、人数都会视情况而定，座谈会对象尽可能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例如在1927年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的调研中，毛泽东调查的对象就比较广泛，包括各县的党、政、工、农、团，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和一般人员，参与人数较多。在韶山银田寺调研中，毛泽东善于启发在场每一个人的话匣子，让大家敞开心扉发言。当时现场有30多人，大家一起讨论，甚至还相互争论，在大家的争论中，毛泽东通过去粗取精听真话，自己对实情的辨别也就越来越清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是践行读书与调研相结合的典范，始终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据湖南党史陈列馆资料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开展的调查研究不下60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也到各地调研不下57次、约2851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调研。毛泽东正是始终根植于调查研究，才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尊人民为师：“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

在革命斗争年代，尽管调查环境复杂艰苦，毛泽东都积极开展调查。哪怕是战火纷飞的情况下，也能沉心

调研，始终依靠人民群众，确保调研收到明显成效。

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认为“甘当小学生”的调查，是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和保障。他以满腔的热忱，以“小学生”的姿态，尊人民为师，不懂就问，不清楚就问，不了解就问。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调查，大多做到了“空杯心态”，非常务实、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体现了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

始终依靠群众。毛泽东在长期的社会调查工作中始终依靠群众，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他认为，在调研中要做到与人民群众惺惺相惜，“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毛泽东乐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体现了人民情怀，因此调研对象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认可和尊重。

与调查对象交心。毛泽东开展调查，善于通过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和典型访谈的方式，与对象以心交心，了解真正的实情。例如，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在韶山200多天，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调查。针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他一家一家走访，一个人一个人长谈，并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社会上对组织开展的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表扬和批评，他都认真倾听、虚心接受。对于农民运动中的“农民问题”，解决得好的和坏的情况都去了解，以全面掌握基本情况。192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找来老家的壮年佃农张连初，诚心与他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了解他家里的基本情况，包括粮食、猪油、茶叶等支出情况，以及粮食收成、喂猪、工食等在内的收入情况都进行详细记录。他通过“以心交心”“解剖麻雀”的方式，搞好典型访谈，了解真正实情，为下一步决策和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

毛泽东长期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认为调查和研究一定要“一是一，二是二”，务实地开展调查和研究。

养成长期开展调研的习惯。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制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长期以实事求是态度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认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将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基本的工作方法，经常使用、熟练使用。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很多新问题涌现，为了探究问题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从身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以上率下，号召大家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始终依靠“问策于民”的调查研究来推动问题破解。

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经常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找到事物症结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及时提出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1927年1月在湘乡考察农运时，农会委员长陪一个农民找到毛泽东，农民有一头牛脚跌断了，再不能耕田，农民想把废牛杀了换条小牛，但县里规定禁止杀牛，且未明确废牛能否宰杀，所以这位农会干部不好做主，特请毛泽东出主意。毛泽东充分了解情况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县里这个规定很好，是对的；但农民遵守规章，来请示农会，我看这条废牛，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又不损害农民利益，就按农民的想法做罢了。”

调查后认真思考总结。毛泽东注重理论总结，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在思考中不断提高真研究问题的能力。例如，毛泽东长期深入群众调研一线，听真话、察真情，善于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分析研究材料，透过复杂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规律。他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典型代表。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考问题、作决策，都把调查研究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提出了很多适合中国实际的好思路、好方法、好举措。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既扎实做到了身到和心到的知行合一，也为自己不断涵养了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

抗战相持阶段的模范歼灭战

——陈庄歼灭战纪念碑碑文敬读

□ 吴耀明

陈庄歼灭战纪念碑位于河北省灵寿县西北40公里处的横山岭主峰上。纪念碑由碑身和碑座组成，高3米，通体为汉白玉石料雕磨而成，碑身高2米，呈平面五角形，碑座高1米，为束腰式形状。碑体正面镌刻着“陈庄歼灭战纪念碑”8个阴刻楷书大字，其余4面刻有碑文，由正定县书法家胡信贤书写。纪念碑是1959年纪念陈庄歼灭战胜利20周年所立，时值灵寿与正定两县合并，故署名正定县人民委员会。碑文如下：

陈庄是我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重镇之一。日寇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以二十五路匪军侵犯该地，被我英雄的军民击退。但敌死不甘心，欲霸陈庄，分割边区，摧毁革命组织，永远奴役人民。终于是年九月二十五日，纠集正定、灵寿、行唐、无极等五县日、伪军两千余人，向我突袭，二十七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侵入陈庄，兽蹄所至，片瓦无存，人民惨遭横祸。

我国革命军八路军师长贺龙将军获悉后，亲率一二〇师星夜奔赴，布置阵网。当敌欢度“中秋佳节”之际，遭我军民猛击，被迫于次日晨，沿慈河东窜。至横山岭，陷入我预伏阵地，将敌压缩于冯沟和破门口。至夜，我军发起围攻，几次冲锋肉搏，敌人死伤甚多。

二十九日拂晓，敌人爬上鲁柏山峰，企图逃回灵寿，我军跟踪追击，重重包围。总攻号角，响彻云霄，枪声炮声，震撼山岳，敌尸遍野，血肉横飞，虽有敌机助战，但也无济于事。

六天五夜的陈庄歼灭战，至三十日晨胜利结束。计毙敌酋水源旅团长、田中大队长及敌伪军一千五百余名，缴获枪枝、弹药无数。

为纪念此次战斗的伟大胜利和保卫祖国英勇健儿，特立此碑，永志不忘！

正定县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

碑文简洁凝练地记载了陈庄歼灭战的经过，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团结人民群众、顽强抵抗日寇侵略

的英勇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在燕赵大地谱写了一曲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气壮山河的赞歌。

精妙布阵，诱敌入瓮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重点放在了华北地区的敌后战场。1939年春，华北日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扫荡”。当时，陈庄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八路军一二〇师后方机关和抗大二分校所在地，也是联系晋察冀军区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的枢纽，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成为“扫荡”的主要目标。

9月下旬，驻石家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纠集正定、灵寿、行唐、无极等县的日、伪军共约2000余人，由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指挥，从灵寿县城出发向陈庄进犯，企图寻歼八路军主力、摧毁晋察冀边区指挥机关。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获悉日军行动后，决心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布成袋形阵势，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歼灭。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被任命为前线指挥，授权指挥各参战部队。

以变制变，因敌制胜

为引敌进入埋伏圈，我军边打边撤，诱敌步步深入慈峪镇。9月25日，日军从灵寿出发占领慈峪镇，分东西两路向北潭庄和南北伍河一线推进。我军阻击日军后佯装败退，在北潭庄到岔头镇一线两侧的山岭上设伏，引诱敌人“钻口袋”。26日，日军退回慈峪，假意向灵寿撤退。不过敌人声东击西的“计谋”很快被我军识破。我军以变制变，先诱敌占领陈庄，后调整部署，在陈庄东侧高地上再次布下“口袋阵”。27日，日军主力以轻装远距奔袭的战术，沿鲁柏山小路急进占领陈庄。此时，我军民早已转移，日军虽然“顺利”进入陈



庄，但却发现扑了个空。当晚，宿营陈庄的日军被我军彻夜袭扰。28日晨，疲惫不堪的敌人焚烧房屋后撤出陈庄，到达冯沟、破门口地区。我军及时判明敌企图，运动中抓住战机，第三次设伏，将敌军牢固于“口袋”之中。被围日军伤亡惨重、不断告急，灵寿、慈峪日军增援，在白头山地区遭阻击，未能突破我军防线。29日，残存的日军二三百人被压缩在鲁柏山主峰，下午6时，我军发起总攻，敌人大部就地被歼，只有十几个漏网的企图逃走，也被我游击队和民兵俘虏。30日上午，陈庄战斗胜利结束，水原旅团几乎全军覆没。经六天五夜的激战，歼灭了日军水原旅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陈庄歼灭战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在河北省一次性歼敌最多、规模最大的歼灭战，创造了山地歼灭战的典范。陈庄歼灭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坚决回击了国民党反共分子、分裂势力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不实谣言，得到了国内舆论界一致称赞。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致电贺龙等表示祝

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致嘉奖电：“陈庄血战，尽歼敌人，予敌重大打击，树华北抗战之楷模，振军威于冀晋，特传令嘉奖。”

以弱胜强，不怕牺牲

陈庄歼灭战的胜利，离不开广大八路军指战员坚如磐石的战斗意志和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在战斗中担任主力，哪里战斗艰苦就冲向哪里；独立一旅二团进行追击作战，不怕伤亡疲劳，两天没吃饭仍连续作战；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五团的战士们同敌人开展肉搏战，枪打坏了，用石头砸，子弹打完了，用牙齿咬；抗大二分校的学员们十几个人分得一把枪、几颗子弹，但作战仍十分英勇。战斗中党员干部带头冲锋陷阵，在伤亡的584人中，党员387人，各级干部124人。独立一旅参谋长郭征在前线指挥部队，打退敌人6次进攻，在冲锋时中弹殉国，年仅25岁。八路军在缺经费、缺装备、缺衣少粮的情况下，打出了士气、打出了信心。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央苏区如何开展干部教育

□ 熊平安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干部是苏区革命事业的基石，针对干部数量不足、经验缺乏、素质偏低等问题，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干部，提升干部专业素养，初步形成苏区干部教育培养体系，为开展反“围剿”斗争、壮大苏维埃政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

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干部。苏区领导围绕巩固苏维埃政权、推动苏区革命这一中心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干部，促进革命理论深入人心，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中央通过发布指示等形式，积极部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31年11月至1933年底，在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有20次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教育工作。1933年8月专门印发《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要求有计划有目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的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的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各地党校和政治学校应运而生，其中，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分别于1933年3月和8月建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各类干部学校重要课程，科学设置党校课程，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中央领导人担任干部学校领导职务，开设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课程教育学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

等苏区领导时常抽空到学校检查工作、亲自讲课、与学员谈心，积极解决干部学习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讲授《苏维埃运动史》《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等课程，并多次应邀作时事报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由刘少奇、陈云讲授《共产党宣言》，李维汉讲授《政治经济学》，任弼时、邓颖超讲授《中共党史》，陈云讲授《职工运动史》，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讲授《军事课》，董必武讲授《西方革命史》。领导干部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授课指导，极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质量。

苏区中央机关党组织率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马列著作读本、政治常识讲义等，在一年半时间里，开办党支部委员会训练班3次共200余人，举办党员流动训练班5批次，把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普及对党员教育，最大限度激发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激励广大党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实际成效。

着力提高干部专业技术水平。苏区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较低、专业能力不强。为此，党和苏区政府把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干部专业技术水平作为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满足不同岗位、不同类型干部教育需求，苏区领导建立师范、农业、戏剧等专业干部学校，大力传授业务知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决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短缺

问题，中央政府于1933年创办中央农业学校。为发展苏维埃文艺事业，培养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专业干部，党和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春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创办中央列宁团校、商业学校和银行专修学校等。通过专业干部学校正规、系统教育，并结合具体实践锻炼，苏区培养了一批各行各业专业型干部。

中央苏区因人施教，根据干部文化素质状况来设置各类教育培训的任务、内容和方式方法。许多工农干部经过短短几年的学习和培训，就能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如许世友、宋任穷、杨得志、王震、康克清、曾山等，就是在苏区时期通过迅速学习各项专业知识成长起来的。同时，苏维埃各级干部积极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学政治理论、学专业知识、学军事技能，形成一种由组织要求参加学习培训到自我要求参加学习培训、自觉挤出时间进行学习培训的良好局面。

初步形成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自1929年4月毛泽东在赣江书院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开始，到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教育总方针为止，苏区干部教育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精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逐步建立起苏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明确把“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作为苏区教育方针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修为主与重点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针。确定干部教育任务，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地听其自然的状态。明确苏维埃文化建设中心任务，即履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制定大量配套制度，为大规模培养干部提供制度保障，促进有序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规范干部教育培训内容。1931年4月，《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规定党校教学内容，军事训练、实际工作常识和政治经济常识各占三分之一。通过规范教学内容，推动形成干部教育培训课程教材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技能教育、文化科学教育、专业技术教育等学科体系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干部学什么的问题，确保学以致用、活学活用、急用急学，提高干部领导力和执行力。

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方式。依托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根据干部文化、政治素质、业务情况以及不同时期重点任务，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部教育培训方式，包括：分批对干部进行脱产培训的干部学校教育；就某些紧急政策和工作对干部进行专题培训的干部会议教育；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普遍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政治培训班；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开展的理论文化知识培训；对承办具体技术性工作的人员开展的业务技能培训；倡导干部个人加强自我学习、自我培训；要求广大干部结合自己工作岗位向领导、同事、群众和实践学习。上述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极大提高了干部教育培训效果。